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 之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

左金隆

(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0047)

[摘要]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人性假设,还是其所应用的阶级分析方法,又或是具体的理论论述中,都可以看到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的运用。当然,在上述的三个方面,其体现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3-0013-05

一、引言

近年来,在制度变迁理论成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点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文献也逐渐增多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就是其制度变迁理论的体现。对此,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大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诺斯^①在其著作中也给予了承认。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国内比较突出的有林岗和刘元春(2000)、林岗、刘元春和张宇(2000)以及林岗(2001)的研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专家也对此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是,另一方面,令人遗憾的是,对其方法论的研究却有待加强。本文在以前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进行研究方法分析(左金隆,2005)的基础上,继续从经济哲学,也就是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对之进行探索。当然,这一研究可以选取的角度很多。但本文选取了方法论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视角对其展开分析,试图得出些许结论以供学人参考。

本文由以下部分组成:首先是梳理、概述了当前理论界研究现状,其次是对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界定,再次着重研究了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体现及其性质。这

种视角分别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人性假设、阶级分析方法以及具体分析中。而且,其性质是唯物辩证的。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二、研究现状概述

从方法论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所蕴含的分析视角究竟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还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又或是二者皆不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众多学者说法不一。比较富有代表性的观点综述如下:

1、胡钧和刘凤义(2003)认为,国内外学者有的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笼统地归结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有的归结为方法论整体主义,这两种归结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的误解。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所使用的方法论既不能简单认为是方法论个人主义,也不能归结为方法论整体主义,而是唯物辩证法。

2、Dugger 和 Sherman(1994)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反对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坚持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且认为把个人虚拟在社会之外是错误的。

* [收稿日期]2007-03-10

[作者简介]左金隆(1975-),男,河南省鄢陵县人,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

3、刘元春(2001)和 Dugger、Sherman 持相同观点,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坚持方法论整体主义。他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首先是马克思的人类行为理论,这是从“具体个体行为的特点”和“实践范畴认识的人的本质”这两个层面分析的。在此基础上,他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的这种方法论整体主义与个体行为决定论、搭便车以及社会有机论这三个方面给予了更详细的论述。

对于胡钧和刘凤义的看法,笔者以为,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的确是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比如说唯物辩证法里面的对立统一规律,在笔者(2005)所论述的矛盾分析法中就有一定的体现。但是,从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现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分析视角与唯物辩证法的应用并不矛盾。

此外,笔者部分同意 Dugger 和 Sherman (1994)以及刘元春(2001)等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确体现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视角,不过,笔者认为他们的分析尚不够全面,首先是有些层面他们没有做出探讨,其次,这些层面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他们并未说明,最后,对于这种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的性质也缺乏探讨,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将在下文做出回答。

三、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界定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为了便于下文分析,我们首先需要对方法论整体主义做出清晰界定。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方法论整体主义这一范畴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来的。它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建构的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后来被广泛用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本着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路,我们用此范畴来探讨其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

关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界定,中外学界说法颇多。中外学界几种代表性观点如下:

1、阿加西对方法论整体主义给出了一个清楚的界定。他的定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是大于其部分之和的‘整体’;(2)‘社会’影响个人的目标;(3)社会体制影响和约束个人的行为”^②。

2、瓦特金斯则将方法论整体主义定义为下列原则,即“个人行为应该从两个方面的推断中做出解释:(a)特殊的、运用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宏观法则

以及(b)对该整体中个人状况(或作用)的描述”^③。

3、立足于上述二位学者关于方法论整体主义所作的界定,卢瑟福(1999:33-34)根据自己的认识对他们关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规定性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并且界定如下:(1)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3)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

4、国内学者汪浩瀚(2002)对于方法论整体主义作了这样的归纳:整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理论必须植根于不可再分的个人集团的行为,它同样可归结为三个方面,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这体现了社会大于自主个人的单纯加总的思想;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个人行为应该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法则及个人在整体中的作用演绎而来。这基本上与卢瑟福(1999)的归纳相同。整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各种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界定虽然有所区别,但却存在着相同之处,因此,可以将其概括如下: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主要包括以下要点,(1)个体行为需要通过整体得到解释;这是因为,(2)整体决定个体的性质和特征;(3)整体不是个体的简单相加。

四、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的体现层面及其关系

这种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它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之人性假设上。

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制度及其变迁,但制度及其变迁的主体却是身处制度环境中的当事人。那么,制度变迁理论分析必然首先要对当事人提出一些基本假设以便开展以后的研究。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存在自己的人性假设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也有自己独特的人性假设。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性的假设根本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那种个人主义视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1995:第1卷,73)。在首先

肯定了作为制度及其变迁研究主体的“人不能脱离制度环境”这一点之后,他们又进一步论述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1995,第1卷:6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明确地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975,第1卷:12)。这两段话就充分表明了,人无法超脱具体的社会制度环境,他要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要理解个人的行为,必须要对个人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进行分析。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脱离现实的人,而是社会的、历史的、发展的人。对于人的分析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制度环境。另外,由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就必须受到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等社会制度的制约和影响。无疑,这显然是一种“个体行为需要通过整体得到解释,整体决定个体的性质和特征”的观点。而这也正是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核心要点。

其次,这一视角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所应用的阶级分析法上。

笔者以前曾经撰文(2005)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探索。在那篇论文中,笔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使用了阶级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以及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等三种具体方法。就这三种方法而言,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在三者之一的阶级分析方法上也是有所体现的。这种“阶级分析方法亦是一种方法论集体主义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不容置疑地是此方法的最强有力的和最成功的倡导者和使用者”(张宇燕,1991:13)。

具体说来,马克思应用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变迁时,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用其分析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这种政治制度的起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国家这种制度是当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才出现的。具体方法是通过暴力革命的途径达成的。其中一个阶级在暴力革命中取得胜利成为统治阶级,而另外的阶级遭遇失败而被迫成为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为了更有力地统治,压迫被统治阶级,所以建构了国家这种政治制度,并且使用从属于国家的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关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阶级分析方法以制度变迁

中的阶级为出发点,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视为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从属物。由此,在阶级这种社会集团中,从属于一定阶级或阶层的人必然受到该阶级本身属性的影响从而展现出一定的不同于其他阶级或阶层的人的性质。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之“整体决定个体的性质”要点在此就得到了完美体现。而且,这种社会集团不是单个人的简单相加,每个阶级或阶层都有自己的独特利益和目标。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不同的。因此,阶级利益,也就是说集体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个人利益的。要讨论个人的利益,必须要考察他是属于哪一个阶级。进一步说,要研究个人的行为表现,也不能离开阶级这个整体的行为分析。这正符合了个体行为需要通过整体解释的要点,同时又在阶级分析这个层面进一步说明了整体决定个体的性质和特征的表现。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具体分析中,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分析视角也是有所体现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的具体分析,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唯物史观的著述之中。其核心内容则是下面这一段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1995,第2卷:32、33)。

套用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思路,实际上这段话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基本原理的说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二者派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这两对矛盾运动是制度变迁的逻辑主线。在这两对矛盾中,生产力决定

生产关系,它决定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状况及程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决定上层建筑发展变化的状况及程度。生产力是首要主导因素,同时也是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这一论断是建立在以下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马克思,1995,第1卷:67)。恩格斯在考察了英国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后说:“英国工业的这一番革命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恩格斯,1973,第1卷:674)。这就充分说明了生产力才是首要的主导因素。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技术就对应着生产力,制度则对应着生产关系。生产力是二者之间的主导因素,换句话说,在制度——技术这对范畴中,技术才是主导因素。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技术变迁。

另一方面,制度与技术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关系,生产力虽然决定生产关系,是首要主导因素,但是,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也具有反作用。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1995,第2卷:83),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生产关系(制度)并不总是阻碍生产力(技术)发展的,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时,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是起到促进作用的。只有当生产关系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之时,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要求才会促使生产关系做出调整,或者发生渐变,或者发生激变。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用以分析制度变迁的立足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无论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些用语都是带有明显的整体的、系统的特点,都属于整体性范畴。生产力是一个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的总体反映,生产关系强调人与人的关系,这也是部分与部分关系的整体抽象。而且,这一概念尤其强调了在所有制这种制度下,整体范围内的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个反映了社会的总体性经济制度,一个则反映了社会总体性政治文化法律等制度,都是一种整体性范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变

迁时并没有把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从个人主义出发,把制度变迁归结到个体由于成本收益的变化而推动制度变迁这一层面,相反,却一直始终坚持整体性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制度变迁的产生和发展。毫无疑问,这里昭示的也是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特征。

综上所述,整体看来,在第一个层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着眼于宏观的层次,指出了当事人必须要受社会制度这种宏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在第二个层面,这种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微观^④细化,当事人不仅要受社会制度宏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还因其身处具体的阶级之中,由此,不可避免地,其个人利益的实现也要受到其从属阶级整体利益的微观影响和制约;此外,如果说前两个层面,就人性假设和阶级分析方法而言,是展开在抽象层次上的,那么,第三个层面,就是这种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的具体层次地体现了。也就是说,深入到了制度变迁的动因和具体过程之中。

五、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的性质

与西方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所应用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之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其性质是唯物辩证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就决定制度变迁的动因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把它归结为生产力这一整体、唯物范畴的变化。而不是像西方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制度变迁来自于人们心理习惯这一唯心范畴的变化。生产力这一范畴考察了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反映了人与物的关系,这确实属于唯物的范畴。但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并没有单纯片面地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是辩证地指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存在着反作用。也就是说制度变迁对技术变迁也存在着反作用。第二、就社会制度宏观环境对人的影响和制约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对此予以肯定,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还唯物辩证地指出,虽然受到社会制度宏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人仍然能在此环境中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并不是制度环境的单纯应激物,而是,人能够通过社会实践认识和改造世界,也就是说,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制度变迁

规律去改造社会制度环境。

六、结论

本文主要探讨了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体现问题。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人性假设,还是其所应用的阶级分析方法,又或是具体的理论论述中,都可以看到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的运用。当然,在上述的三个方面,其体现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而且,整体看来,这种三个层面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体现呈现出了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顺序。在抽象层次,又可分为宏观抽象和微观抽象两个阶段。另一方面,就这种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的性质而言,它仍然是唯物辩证的。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人在社会制度宏观环境的制约下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主动能动性。

[注 释]

- ① 详见道格拉斯·C·诺斯. 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63.
- ②③ 转引自,马尔科姆·卢瑟福. 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4.
- ④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这种微观与宏观的划分是相对意义上的。和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微观划分有所不同。当然,这种划分方法是否正确,有待商榷。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4] 道格拉斯·C·诺斯. 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5] 马尔科姆·卢瑟福. 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6] 张宇燕. 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7] 林岗,刘元春.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J]. 经济研究,2000,(6).
- [8] 林岗,刘元春,张宇.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
- [9] 林岗.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比较[A]. 收录于林岗、张宇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C].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 [10] 汪浩瀚. 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J]. 经济科学,2002,(2).
- [11] 胡钧、刘凤义. 论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与唯物辩证法——老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之比较[J]. 教学与研究,2003,(2).
- [12] 刘元春. 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A]. 收录于林岗、张宇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C].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 [13] 左金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财经理论与实务研究,2005,(2).
- [14] Dugger, William. M and Sherman, Howard. J. Comparison of Institutionalism and Marxism [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8, No. 1, 1994.

(责任编辑:朱德东)

On methodological holism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of Marxist Economics

ZUO Jin-l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The use of methodological holism is embodied in the human hypothesi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of Marxism economics, in the use of class analysis methodologies and in concret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course, the contents and expressing form are different in the above three aspects.

Keywords: Marxism economics;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methodological holism